

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另一种书写

——以重读五四作家郁达夫小说创作为例

杨洪承

【摘要】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和五四作家郁达夫已有文学史的定论,但是,在郁达夫研究中,往往单独冠名多愁善感、风流才子、现代文人、革命作家、浪漫主义作家、抒情小说家的研究成果较多,而以整体观的革命文学视角全景审视郁达夫其人其文相对单薄。今天纪念“五四”百年,重新考察五四作家郁达夫完整的人和文,寻踪五四以来作家小说创作的演变过程,特别重读被人关注不多的作家那些偏重写实性的作品,获得的不仅是郁达夫个案研究的新知,而且还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再认识。现实主义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在郁达夫笔下既写实于外部世界的社会现实人生,又忠诚于自我内在精神情感的真实;既以非写实的虚构故事传达作家对时代风云和社会政治的切身感应,又以务实的言行走进了左翼文艺运动和反抗侵略者的抗日战争,其一生就是富丽悲壮的史诗。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正是在郁达夫那里有了不一样的世界。

【关键词】革命文学;郁达夫;小说创作;五四作家

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革命文学,不乏有陈独秀、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郭沫若、成仿吾、瞿秋白、冯雪峰等一大批不同身份立场、不同文化视野、不同思想资源的革命作家。他们以五四思想革命为根基,影响了五四文学革命、社会政治革命,及其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理论倡导。这是从思想革命走向社会政治革命的脉络,也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线路。这些革命作家既在顺应历史的推助而生成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又在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自身建设的反思中,不断重构了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这两者同步而行又始终彼此交替交融,大体可以清晰地呈现出其内外谱系和思想结构的形态,即表现为民族意识危机、人文思想重建、反传统的历史发展之逻辑思路。但是,这个形态的内涵和思想的脉络,准确的说,更多侧重反映的还是思想层面的革命文学观念的生成和其精神源流的理论建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崭新的文学理论,更应该是与全新的文学表现和创作实践相联系的。当

杨洪承,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7)。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社群结构与作家谱系研究”(14AZD080)的阶段性成果。

然,现代中国文学不无可以列举出叶圣陶、茅盾、蒋光慈、丁玲等为代表革命作家的创作实践成果。他们笔下的革命文学作品切实地在跟踪反映现代中国重大社会历史事件、政治革命斗争和运动,忠实地在关注现实人生的疾苦,民众苦难的挣扎和反抗。诸如记录了近现代以来辛亥革命、张勋复辟、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叶圣陶的《倪焕之》);完整反映了1927年的国民革命的全过程(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的《蚀》三部曲);对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现场实录、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记叙(蒋光慈的《短裤党》和《咆哮了的土地》);1931年最先将目光注视到平民大众,全国震动的16个省的洪涝灾害,民不聊生,农民抗争,阶级矛盾加剧(丁玲的《水》)等等。但是,这些以现实主义创作主导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想象书写,由生活的体验向艺术审美表达的创作实践,最突出的还是现代中国崭新而务实的革命文学思想理论观念之积极回应,本质上多为立足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原生态意识形态写实的基础。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尊重文学史的真实性,那么对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谱系与结构的完整还原,真正将社会人生、政治现实化为有血肉、有温度的鲜活生命的表现,现实主义本体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总是有所限制的,也必然是一种内容和形式结构开放的、渐进发展的多元综合体,重视文学史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的作家作品,尤其伴随着五四新文学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初期创作,“革命”既是思想文化到社会政治,从知识分子自我的呐喊到民众的觉醒、新兴阶级的崛起的现代历史进程,又是真正独立个体和群体融合的共同表达,呈现出极其丰富而复杂的多声部重奏、互动的生命形态。这使得我们注意到五四作家郁达夫(1896—1945),这样一位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代表的小说家,人们很少地将他与现实主义的革命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尤其长期以来在现代文学郁达夫研究中,往往单独冠名多愁善感、风流才子、现代文人、革命作家、浪漫主义作家、抒情小说家的郁达夫研究成果较多,而以整体观的革命文学视角全景审视郁达夫其人其文相对单薄。反之,今天重新完整考察郁达夫的人和文,寻踪作家五四以来小说创作的演变过程,特别认真重读作家那些被人关注不多的写实性作品,有些甚至作家自己也不看好的作品,恰恰有了不同的收获。郁达夫的个案给了我们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丰富形态新的认知。

法国学者勒庞在论述革命与心理学的关系时言:“宗教与政治的革命在其刚刚兴起之时,很有可能得到理性因素的支持,但革命只有借助神秘主义或是情感要素的力量才能继续发展,而这些要素同理性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①如果说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观念形态的思想主张的形成与演变,不无有时代社会政治的变革推助起了很大的作用,与先进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自觉有着关联,那么作为文学自身形态的革命文学创作实践,应该离不开作家印象感觉的理想情感的“革命”,及生命体验和理解的精神“革命”。“革命”也应该是作家笔下精神心灵、审美世界不自觉的集体无意识的情感流露和美的传达。每位作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尤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作家,他们饱经社会大时代变革的风雨,各自有着不同家庭的兴盛衰落和不同人生的坎坷和沧桑。这使得文学不仅有现实人生的印迹,而且有着体验人生的诗意之魂灵。鲜明时代特色和历史规律反映的革命文学,同样也是出自作家不同感受、理解不同风格、不一样书写和表达的文学追求。现代作家中不乏桀骜不驯、洒脱随性,又有平实儒雅、冷静客观,也有感伤浪漫、内心忧郁等各色人格文风。同样,现代中国革命文学虽然有着大时代政治斗争的厚重底色,但正是作家个性化的体验与感知,赋予了革命文学内部结构的张力和思想的质地。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的丰富表达:从主观到写实;由冷静到暴露;从动摇到追求;从崇拜到疏离;个人与群体、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变奏等等,描摹了一幅色彩斑斓的革命文学历史形态的谱系图。

郁达夫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代现代作家文学史已有定位。早在1946年他刚刚遇难,胡愈之就

^① [法]古斯塔夫·勒庞:《导论:历史的修正》,佟德志、刘训译:《革命心理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页。

有这样的评价：“他的一生是一篇富丽悲壮的史诗。”他是“一个复杂的不平常的人物”^①。后来的文学史家说他是一位现代浪漫主义作家，甚至是一名革命作家都是可言之凿凿的。比如后者，郁达夫以一个大胆叛逆、主观色彩浓烈的现代作家形象问世于五四文坛的同时，其思想层面也不乏强烈的社会政治观，并且与时俱进。几乎与张闻天、恽代英、邓中夏、肖楚女等一批早期共产党人同时期，1923年就提出“阶级斗争”概念，“我想学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大声疾呼的说：‘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者，在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凡对有权有产阶级的走狗对敌的文人，我们大家不可不团结起来’”^②。同年，还介绍过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赫尔岑^③。1927年党派政治的“四·一二”事件发生前夕，创造社大张旗鼓地倡导革命文学的前一年，郁达夫就撰文《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明确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及阐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真正彻底的革命，若不由无产阶级者——就是劳动者和农民——来作中心人物，是不会成功的。”“我在此地敢断定一句，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有无产阶级者自己来创造。”^④“现在的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要求支配政权，要求解放的革命，那么我们现在所要求的革命文学，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⑤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发生发展中，郁达夫是“左联”团体的发起人之一，与鲁迅共同编辑刊物《奔流》，积极参与各种左翼文学活动，如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左联”五烈士、丁玲等作家；与鲁迅等发起签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上海文化届告世界书》等。抗战爆发，郁达夫是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常务理事，兼任研究部主任。抗战中后期，应《星洲日报》之邀去新加坡，后到苏门答腊之地避难隐姓埋名，遭遇告密而被逮捕，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时年仅50岁。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郁达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7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烈士证书。2014年9月，国家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其中，就有郁达夫的名字。

严格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并不完全只是一批具有革命者、政治思想家身份的作家的倡导和革命实践。文学与作家身份之间是一种认同和背离、特殊而复杂的文学现象。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多彩历史形态的谱系，最能够呈现其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现代著名的浪漫主义革命作家郁达夫给我们提供的较为多样化的文本和丰富的创作实践，远比他的直接的言说、一些直观的社会活动，可以更能够反映出作家最真实的心灵世界。他作为五四新文学第一代老作家，其虚构的文学世界中的现代中国革命融合了独特的个人经历的体验、社会活动的感受。这使得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最初的发生显现出丰富多样的内在意蕴。

二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第一本小说集，也是五四新文学的第一部小说集《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单行本。这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已有定论毋庸赘言。该集共收入三篇小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其中以《沉沦》影响最大。《沉沦》出版以后引发的社会反响，褒贬不一的批评与肯定都十分强烈。如同近一个世纪以来小说受到各种各样的解读一样，无论当年在一片“不道德”的谩骂声中，周作人、郭沫若直言回击予以小说中肯评判，还是经历特殊年代小说被读出“色情”“颓废”，到新的历史时期文学再反思，及作家本真自我和作品主观抒情的风格被重新挖掘。这些无不反映

①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香港：咫园书屋，1946年，第34页。

②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创造周报》1923年第3号。

③郁达夫：《赫尔岑》，《创造周报》1923年第16号。

④郁达夫：《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的文学》，《洪水》1927年第3卷第26期。

⑤郁达夫：《〈鸭绿江上〉读后感》，《洪水》1927年第3卷第27期。

了郁达夫创作的艺术倾向和《沉沦》作为第一部小说思想有着不断重读的独特价值。沿着郁达夫小说的“自序”：“《沉沦》是描写一个病态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①我们不难认识和理解小说的基本艺术格调、作品中主人公的形象特征和思想内涵。因为小说本身确实不是在讲述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而是围绕着“他”意识的流动展开的。小说中的8个章节，除了第3章节交代“他的故乡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去杭州水程不过八九十里”。“他三岁时候就丧了父亲”。这些具有叙事性的写实外，其中7个章节在不断叙述开篇“他近来觉得孤冷等可怜”，“他的抑郁症愈闹愈甚了”的孤独心理状态，及由此带来的言的宣泄与行的片段，构成了小说侧重主观心理流动的情节结构。当然，小说中也不乏有“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够安慰俄体谅我的‘心’。……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祖国呀祖国！俄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样指向鲜明的言辞，直率地表露出那个新旧交替时代对爱情的大胆赞誉和强烈的爱国意识。还有小说中的“他”生存的困顿、精神心理的病态、低下卑微的人格，也都在自我的倾诉和表白中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他”是一种社会“多余人”“边缘人”的形象典型。周作人对小说《沉沦》的称赞，一是“人类的本来”，二是“一件艺术品”^②。真正艺术品与人的本真相联系。显然，郁达夫虽然直观描写非常人，乃至病态的“他”人，但是以反其意或“非人”表现的是人的内在本真，真正具有了现代人的气息。这无疑正属于五四新文化以来呼之欲出的“真人”，一种亟待创造的“革命文学”。它之前多为“非人的文学”^③“瞒与骗”^④的文学。如果说五四伊始陈独秀是在理论上倡导一场民主和科学的思想革命、伦理道德革命，那么郁达夫是以真实的自我人生经历和现代人的感受，创造了第一次表现和描写现代“真人”意识流动和生活片段的一种革命文学的样态。他以人物自叙的方式丰富了五四的思想革命。因为“真正伟大的革命是行为方式的革命和思想的革命”^⑤。这部小说不仅以文学创作实践的形式积极配合了陈独秀发动的思想文化革命，而且区别于鲁迅小说寓意象征性的“狂人”形象塑造，也不同于郭沫若“女神”新诗创作人与自然一体的泛神“英雄”想象。郁达夫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我觉得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作品里的Individuality（个性）是决不能丧失的^⑥。《沉沦》这篇小说作为五四文学中率先大胆以作者自己的经历和个性创造出真实的“他”。虽然这个“他”卑微、病态、性苦闷几乎超出了正常人，但是能够感受到作者“是将它在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中具体化起来了”^⑦。郁达夫将自己的人格个性与小说艺术的主观性紧密的融合，创造了五四以来从未有见过的“真人”，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叛逆革命。郁达夫以其独有精神思想的反叛性，使得小说人物的真实感具备了革命的穿透力。美国学者曾说：“对任何现代革命的理解，至关重要的就是，自由理念和一个新开端的体验应当是一致的。”^⑧《沉沦》能够成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早期文本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小说有着这种理解革命的“新开端的体验”。

郁达夫理解革命的“新开端的体验”并没有只是停留在意识流动的自叙，思想精神“沉沦”的反叛阶段。通过世界中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斗争历史经验，他感悟到既尊重自己情感的真实，又重视人生经历的现实体验。“二十世纪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几乎要同社会实际的阶级斗争，取得一致的行动

①郁达夫：《〈沉沦〉自序》，《郁达夫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第149页。

②周作人：《“沉沦”》，贺玉波编：《郁达夫论》，上海：大光书局，1936年，第100页。

③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

④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坟》（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8页。

⑤〔法〕古斯塔夫·勒庞：《第一卷：革命的一般特征》，《革命心理学》，第4页。

⑥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文学周报》1927年第5卷第10期。

⑦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

⑧〔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了。”^①郁达夫寻求着贴近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实际的完整而真实的表达,积极调整着自己文学创作实践的方向。1923—1926年间,郁达夫的小说有了明显的不同色调,表面上只是自叙与写实的双线叙事结构的运用,内在透露出某些新信息,作家又一次通过自觉的文学实践探索,传达出对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新的意义之寻找。这个阶段郁达夫的小说中,除了“于质夫”“李白时”,类似于《沉沦》“他”的作者自我叙述的知识分子者形象外,增添了许多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人,诸如N烟公司一个包纸烟的女工陈二妹(《春风沉醉的晚上》),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薄奠》);甚至有了一群(曾、邝、于、霍四人)本想努力研究文学,但为生活所困又不得不各自离散的人(《离散之前》);还有都市中洋房里住着的老二老三等三四个年轻女子、华侨富商、大学生等各色人群(《过去》)。郁达夫本人的解释,这些多为社会下层不幸群体的出现“多少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②;同样也有研究者认为,作者将这些人物形象与知识分子的“我”“他”“于质夫”“质夫”等并列,本质上还是为了衬托知识分子的张扬个性,表现自我。作家自述和随着作家思想特征的阐发应该有一定的说服力。寻踪郁达夫的生活经历和其创作的联系,可能更贴近作家本身的实际样态。这段时间里他从日本回国后,生活十分困窘,辗转北京、武昌、安庆等多地的学校以任教为生;同时,还在筹办创造社的《创造周报》《创造》季刊、《洪水》周刊等刊物,与出版社、书局、杂志社老板等各种人打交道。1924年7月29日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有这样的叙述:“这一次到北京之后,已经差不多有两个半月的时间,但这两个半月中间,除为与《太平洋》杂志社合作事,少行奔走外,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书也不读,一半大约也因为那拿衣服首饰换来的一百块钱消费太快,而继续进来的款子没有的原因。”^③由此,这时期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的社会因素的增多,尤其对被损害、被侮辱的下层民众的生活的关注和同情,所表现出的很大程度是对自己人生和生活的体认和共鸣。这里郁达夫思想意识的变化过程和其出现某些革命元素的体验,一方面是他“沉沦”期自我的宣泄、个性的尊崇之底色,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生阅历的拓宽,而自然升华的人道主义关怀凸显出社会因素;一方面是他继续将自叙的故事与个人的经历的融合叠加,表现出对社会人生体验式的积极探索。这期间郁达夫与穷困的青年作家沈从文之间在京城有一段交往的真实故事,既可以与他这时那些有明显内容转变的小说对读,又能够发现作家革命意识渐变生成的思想线索。不妨看看1924年11月13日郁达夫致沈从文的信中叙述的语气和内容:“我说了这半天,不过想把你的求学读书,大学毕业的迷梦打破而已。现在为你计,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然而土匪你是当不了的,洋车你也拉不了的,报馆的校队,图书馆的拿书者,家庭教师,看护男,门房,旅馆火车菜馆的伙计,因为没有人可以介绍,你也是干不了的——我当然是没有能力替你介绍——所以最上的上策,于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罢,去制造炸弹去罢!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的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的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污泥来调和的呢?这些事情,你去问上帝去罢!我也不知道。”^④这与同年8月郁达夫小说《薄奠》中,坐在车上“我”与洋车夫“攀谈”的对话,以及“我”所思所想的语调有很多相近似。并且直言小说中“我”主动找洋车夫“闲谈”,是想“缓和他的劳动之苦”,也是从自己经验出发的,更是他在“实行浅薄的社会主义”。这里找到了后来作家自叙作品内容的某种“色彩”的出处,作者思想的印记也正是从难以区分的虚构与非虚构的故事之间、知识分子“我”与下层社会人们之间自然流露出,这样的思想转变显然有带着体温和血液流动的真实感。

①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

②郁达夫:《〈达夫自选集〉序》,《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05页。

③郁达夫:《给沫若》,《郁达夫文集》(第3卷),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第256页。

④郁达夫:《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118页。

三

1930年代以后,郁达夫的小说创作量在减少,可是1932年的《她是一个弱女子》(也叫《饶了他》)和1935年的《出奔》两部中篇小说却别开生面。他一改前面小说创作中多偏重的主观色彩,而开始转向了社会生活的写实。郁达夫这一转变与中国社会大的时代情势变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现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此时的迅速兴起有着关联。当然,更重要的是,郁达夫由自我创作实践的调整呈现出文学与革命关联的独立认知。他在坚持沿着自己写作路线前行的过程中,同时自觉与不自觉地伴随着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生发展。他虽隶属创造社团体之中,但没有许多成员从前期转向后期表现出的如此激进姿态。他也参与和经历了革命文学的倡导,但革命文学的认识更多立足社会政治层面的陈述和理性的议论。这里寻觅作家个性化的创作实践,或者追问郁达夫究竟如何通过艺术审美的方式传达其革命思想的?就可以发现就其创作本身而言,郁达夫本来并不着意要创作什么革命文学,但是作家故事的叙述和写实的背后,总能给人感觉还是郁达夫自己,除了作品“后叙”和散文随笔、书信日记中的直接交代说明外,还在创作样式上的取舍和作品形式结构上的意识形态化处理,为我们提供了文学史另一种革命文学读本。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郁达夫立意“是在造出三个意识志趣不同的女性来,如实地描写出她们所走的路径和所有的结果,好叫读者自己去选择应该走哪一条路”。这样小说有了“一个是代表土豪资产阶级的落伍女性李文卿,一个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犹疑不决的女性郑秀岳,一个是代表向上的小资产阶级的奋斗的女性冯世芬”^①三个不同女性形象的塑造。而郁达夫在最后写的一部小说《出奔》中,完全不同于他过去自我中心、情绪结构的小说创作。北伐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干部钱时英,与地主董玉林、地主女儿董婉珍之间阶级的冲突、情爱的纠缠,始终伴随着正在进行时的那场扑朔迷离、迅速变化的国共两党从合作到裂变的革命过程。这两部小说共同的是对1924到1927年间大革命时代社会生活、革命情势的跟踪反映,都是直接以人物活动构成叙事中心的写实性文本。前者通过三个不同女性的人生道路,传达作家对其人物否定和肯定,及同情的态度立场十分清晰;后者尽管人物关系有些复杂,可是小说旨在叙述革命干部钱时英一度难以自拔的情爱 and 家庭的桎梏、一再压抑的心中愤恨的状态,最终还是摆脱了思想矛盾的困境,勇敢地点燃了地主的宅院离家出走的主题思想也是明确的。特别明显的是《她是一个弱女子》小说发表以后,由于故事很强的纪实性不乏有读者对号入座的询问,也因内容的进步倾向遭到政府的查禁。为此,郁达夫的这两部作品无论是其写作内容还是表现形式,被列为真正意义的革命文学文本应该是无异议的,文学史认为代表作家创作风格发生转变的标志也是能够成立的。但是,对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郁达夫自己并不看好,小说“后叙”中言:“我觉得比这一次写这篇小说时的心境更恶劣的时候,还不曾有过,……我作品之中的最恶劣的一篇。”^②而写完《出奔》之后我们未见作家再有小说创作了。就作家而言,此刻“左联”团体明确要求作家的创作“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尤其是那些最能够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③诸如描写中国劳苦民众的苦难和受压迫受剥削;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等等。1930年前后郁达夫正置身于左翼文艺运动之中,一方面他自觉地响应“左联”组织的号召,在创作上有所调整和主动试笔,另一方面他又不满意立意过分明确的作品,认为是“最恶劣”之作,或者不再延续这样的创作。显然,被我们阅读的郁达夫的这些文本是在作家非常复杂而矛盾的心境下的创作。郁达夫始终尊崇文学创作某种程度就是作家的一种精神情绪的外泄方式。他的革命文学的写作也不例外,他自

^①郁达夫:《沪战中的生活》,《郁达夫文集》(第3卷),第194页。

^②郁达夫:《我是一个弱女子》,《郁达夫文集》(第2卷),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第800页。

^③《1931年11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文学导报》1931年第1卷第8期。

叙《她是一个弱女子》小说的题材,“我是在好几年前就想好了的”^①,可是真正开始虚构故事多少受到现实与记忆的提示,更与小说里同一时间自己极其糟糕的心境有着关联,即1926年长子龙儿患病夭折,1927年的4·12反革命政变,1931年“左联”五烈士的遇害,1932年的1·28的淞沪战争。1926年11月3日的“日记”里写道:“啊啊,儿子死了,女人病了,薪金被人家抢了,最后连我顶爱的几箱书都不能保存,我真不晓得这世上真的有没有天理的,我真不知道做人的余味,我想哭,我想咒诅,我想杀人。”^②而1931年7月6日致周作人的信中,郁达夫也有情绪极低的这样自叙:“自广东回沪之后,迄今五年,因为一时的昏迷,就铸下了大错。……五年来无心创作,无心做事情,……近来消沉更甚,苦痛更深。”^③就是经历了这样时事多变,人生跌宕的五年之后,郁达夫续写了早已构思而未动笔的三个女子的故事,叙述她们中情爱的迷乱,生活的腐朽,灵魂的堕落(李文卿);在疾病、失业、贫穷中苦苦挣扎,也难逃脱侵略者的惨害(郑秀岳);勤奋学习,勇敢面对现实,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新女性(冯世芬)。在身份鲜明的三个女性中,郁达夫并非是三个人物三条道路的平行并列展开,也不是着力要强调新女性冯世芬是如何革命的,或如何成长为真正的革命战士的。小说以“我的名字叫郑秀岳”开篇,以“冯世芬收殓被惨杀(郑秀岳)的遗体”结束。显然,对郑秀岳人生经历的叙述形成了小说中心的结构主线。这里有着作者最深厚的人道主义的同情,更有着自己多难苦痛人生的写照和美好生活的期盼。小说写作于淞沪战争爆发,逃难之余。1932年小说上海潮风书局初版的扉页上题辞:“谨以此书,献给我最亲爱,最尊敬的映霞。”这里一方面多少可见作者写作寄托着一种内心情感的期许,另一方面小说也反映有意将此时此刻本人情绪低落、精神消沉、苦痛之心境,融入在不同女性的人生经历与社会历史的时事巨变一一如实纪录之中。这与其说是叫读者选择其中的一条道路,倒不如讲是作者试图借此虚构的故事给自己一种人生的选择,试图探索着能够走出情绪低谷的方式。这如同1934、1935年前后,郁达夫闲居故乡,游历山水之间,一边写下了《两浙漫游后记》《超山的梅花》《花坞》《皋亭山》《过富春江》等大量游记散文,一边完成了应《文学》杂志所约“不得不写之稿”^④的中篇小说《出奔》。小说“避难”“暴风雨时代”“混沌”“寒潮”等鲜明社会政治特征的小标题,与小说努力写出一个复杂身份的革命干部钱时英形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小说并不重在塑造革命干部典型的钱时英,也非一定要对社会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全景纪实,而是将记叙生活、事件的片段连缀,小说最后一节的标题“药酒杯”却由纪实转向暗示。这节叙述的是,在“革命不忘恋爱,恋爱不忘革命”中,钱时英与董婉珍结婚成家了,婚礼上岳父地主董玉林转身侃侃而谈投机革命,婚后妻子却变成了骄纵的主妇,在丈夫党部里辞职后,表现出冷淡、轻视,最终使得钱时英久久压抑心头的怒火爆发,火烧了这个地主的宅院。革命干部钱时英一直追求的革命与爱情似同一杯苦涩的“药酒”,最终的反抗与出走也正是由此刺激的壮举。浪漫主义小说作家郁达夫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革命文学创作方式,又不失对自己主观情感世界某些真实的保留。《出奔》小说之后,郁达夫虽然没有续写虚构的人物故事,但是他以自己实实在在的言与行,真正开始了一个革命者的人生之路。这也恰恰反衬了郁达夫革命文学创作的独特色调。五四时期的“沉沦”,郁达夫不就是以出格的暴露和大胆的宣泄,与同时期作家的创作明显的不协调,“不完全处,缺憾处,乃反面正是给人十分尊敬之处”^⑤。始终忠实于自己创作个性的郁达夫,既真实地传达自我内心丰富而复杂的精神情绪,又如实地记叙社会现实和人生经历,给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写作,更多呈现了独有的个人化印痕,很值得我们现代中国文学史珍视。

(责任编辑:程天君)

①郁达夫:《我是一个弱女子》,《郁达夫文集》(第2卷),第800页。

②郁达夫:《劳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9卷),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第9页。

③郁达夫:《88致周作人》,《郁达夫文集》(第9卷),第421页。

④郁达夫:《秋霖日记》,《郁达夫文集》(第9卷),第245页。

⑤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贺玉波编:《郁达夫论》,上海:大光书局印行,1936年,第85页。

A Different Version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May 4th Novelist Yu Dafu's Fictional Creation

YANG Hongcheng

Abstract: Though there is little dispute over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Yu Dafu as a May 4th writer, the previous studies mostly focused on such aspects of this great modern Chinese writer as his rich emotional world, unrestrained lifestyle, and his status as a modern scholar, a revolutionary writer, a romantic writer, and a novelist who was good at depicting human feelings. There is a lack of a panoramic view on Yu and his works by putting them into the whole picture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herefore, when we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visit Yu Dafu as a complete man and all his works in order to trace the evolution of novel writings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general and in particular to re-read the works focusing on describing the social realities produced by those writers who have been given less attention. This will not only bring us new understanding of Yu Dafu but also help us gain new knowledge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generated by the May 4th Movement. Under the pen of Yu Dafu, the realistic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does not only depict the social realities in the outside world, but paints a faithful picture of the novelist's inner world realities as well; the fictional stories reflect the writer's 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social realities. In addition to that, Yu Dafu joined the left-wing literature movement and anti-Japanese war with practical discourse as his weapon. In this sense, his life formed a great epic and mad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Yu Dafu; fictional creation; May 4th writer

About the author: YANG Hongcheng,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